

# 严复国民性改造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考察

韩建萍

(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1)

**摘要:**严复国民性改造思想影响巨大,探讨其产生原因对更全面地了解这一思想不无裨益。首先这一思想的提出是由于民族危亡,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对严复的刺激。社会改革运动的失败,特别是洋务运动的失败也让严复意识到物质层面的改革并不能挽救中国,将国家贫弱的症结转到了传统国民性上。西方人对中国传统国民性论述的话语启发,对严复反思传统国民性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新的参照系的出现也引发了严复对中西国民素质的比较。

**关键词:**严复;国民性改造思想;民族危机;洋务运动;西方思想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5)02-0055-06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民族生存危机愈发严重的境遇下,思想界产生了民族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痛苦省悟,一场从主体层面进行深度思考的国民性改造思潮兴起。而最先将中国贫弱的症结转移到国民性这一问题上的即是被誉为“近代西学第一人”的严复,他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新民思想,成为首先关注国民性的第一人,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完整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严复国民性改造思想本身,对其产生背景研究较少。本文力图从民族背景、社会背景、外部影响入手探讨严复国民改造思想产生的背后动因。

## 一、民族危机、救亡图存

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以甲午中日战争为转折点,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本质上的变化。小小的日本藩国竟然击败了泱泱中华,这让西方列强意识到,古老的中国已失去了天朝上国之威,成为任人宰割的沉默羔羊。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世界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充斥着狂热的扩张欲望。随之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强占租借,划分势力范围。他们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开矿、建厂、开银行,通过各种政治借款,逐步控制中国的关税、盐政、内地税等财政收入,使中国更深地卷入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附庸的地位进一步强化,人民大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传统观念中老子的贵柔守雌,孔子的君子无所争,在西方列强的入侵面前,已经不是“和而不同”所能应付的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一退再退,已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退无可退。经过这样一番残酷的血与火的洗礼之后,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在中西对阵的硝烟与战火中,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对手是这个与世隔绝的天朝上国的君君臣臣所不曾见识的,是来自历史经验以外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船坚炮利使国人在战争中相形见绌。“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炮,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sup>[1]</sup>。中西武备方面的差距,使清朝官兵在两军对战中,往往身首异处,血染疆场,“可

收稿日期:2014-11-28

作者简介:韩建萍(1985-),女,山东章丘人,助教,历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怜裹尸无马革，巨炮一震成烟尘”<sup>[9]</sup>。面对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有志之士纷纷发表时论，康有为在北京保国会成立大会的发表演讲中说“吾中国四万万，无贵无贱、当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不能言者也”<sup>[3]</sup>。谭嗣同此时勇敢地发出“冲决网罗”的强烈呼声：“时局之危，有危于此时者乎？图治之急，有急于此时者乎？”<sup>[4]</sup>严复也于甲午战争后相继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及《救亡决论》四篇政论文章，他感慨道：“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sup>[5]</sup>“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此乃奇耻大辱也。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开始进一步反思，继续寻求着民族救亡图存的道路。他们开始重新认识这个陌生的世界，同时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

严复以他学贯中西的知识背景，对中国战败的根源与救亡的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今日中倭之搆难，究所由来，非岂一朝一夕之故也哉！”<sup>[5]</sup>中西事理的不同，造就中西国民性的不同，正是西方国民素质的优秀成就了西方今日国家的强大，正好相反今日之中国却“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sup>[5]</sup>，故要挽救民族危机，救亡图存，“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sup>[5]</sup>。严复在分析了中西国民素质差别的基础上，首先将国家贫弱的症结转移到中国传统国民性上，提出国家强弱的关键在于国民的优劣，以一种新的视角寻求救亡之路。

## 二、近代社会改革失败的反思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先后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失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在民族自尊心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还在艰难地探索着民族的出路。魏源的《海国图志》是第一部详细介绍世界各国史地知识的著作，其中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在军事技艺上学习西方。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提出了近代中国不如西方的地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sup>[6]</sup>他主张通过“制洋器”进而“采西学”以达到“自强”之路，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国富强之术”的著名论断后成为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蓝本<sup>[6]</sup>。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轰轰烈烈的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开展了三十多年，引进了西方的军事、民用工业技术。但社会经济结构的近代化需要与政治制度以及人们的主观思想相一致，洋务派在上层建筑却是坚守落后的封建统治，“中体西用”的理论指导注定这次改革运动将以失败告终。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维新人士对甲午战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严复执教的北洋水师学堂也是洋务运动的一部分，在其总办的十余年间，见证了北洋的黑暗与腐败，但对于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却是没有料到的。特别是同窗好友邓世昌、刘步蟾的壮烈牺牲以及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二百多门生也伤亡过半，严复有比其他人更多的悲愤与心痛，他揭露洋务运动的实质为“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sup>[5]</sup>。严复分析道：“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发者亦不少矣”，译署，同文馆，船政，出洋肄业局，轮船招商，制造，海军，海署，洋操，学堂，出使，矿务，电邮，铁路等十几项，“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之行，则准橘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者，则又何也？”其原因在于“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盖政如草木焉，置之其地而发生滋大者，必其地之肥饶燥湿寒暑与其种性最宜者而后可”<sup>[5]</sup>。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其人心风俗与施行之法是否相宜，学习西方近代的富强之术，要有相适宜的近代政治制度与有近代思想基础的民众。严复于1898年的《国闻报》上指出：“夫君权之重轻，与民智之浅深为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呼！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sup>[5]</sup>故他将改造国民性作为

改革的前提条件。

在严复的影响下,维新人士纷纷提出,洋务运动失败在于“新其政不新其民,新其法不新其学”<sup>[7]</sup>,今日中国“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虐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sup>[8]</sup>,认为改造国民性是救亡图存的根本,是近代社会改革的第一要务。

### 三、近代西方人对中国传统国民性论述的启发

18世纪中叶的欧洲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民主制度的形成,一种自我价值的重估要求建立,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对古老中国的顶礼膜拜转向了充满想象的偏执批判。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亚当·斯密等也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这个神秘而遥远的国度。1793年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认为中国民族表现出“某种与人类精神不一致的停滞、平庸、屈辱乃至偏见,由于种种荒诞的偏见,科学竟致沦为一种永恒的卑微;在那里甚至于印刷术的发明也全然无助于人类精神的进步。”在那里我们“还看不到理性可以照亮她并打碎她的枷锁的那个时刻,衰落、愚昧、腐化成为整个东方民族显示的基本情形”<sup>[9]</sup>。1748年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写道:“传教士被中华帝国秩序的外表所迷惑,欺骗、虚伪是所谓礼仪之邦的特色。事实上,那是一个不可能找到任何自由精神痕迹的国度,专制、恐怖、奴役成为礼制的核心意义。”<sup>[10]</sup>这些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巨著都对神话般的中国形象进行了简练而有说服力的扭转。

而在鸦片战争后,闭关锁国的中国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传教士、商人、使者、旅行家等带有不同身份的西方人纷纷来华,他们以不同的视角,怀着不同的目的,记录下了对中国传统国民性的多层次的、内容纷繁复杂的文字。“可以说近代启蒙思想家对中国国民性的反省是在西方的国民性话语的启发下,在外籍人士有关中国国民性之言说的影响下展开的”<sup>[11]</sup>。西方观察者试图通过自己在游历中接触的中国各种类型的人物和了解的各地的风土人情来分析中国民族的特征。19世纪中期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的《中华帝国》(1854年)一书是最著名的著作之一,“作者用典型的传教士的手法,把中国描写成一个脱离宗教影响、具有悠久文明,并正在迅速走向腐败和灭亡的民族”<sup>[12]</sup><sup>32</sup>。

在中国生活了22年的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中文名为明恩溥,1890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书中肯定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比如:节俭,勤劳,忍耐力强,爱好和平,孝顺等。重点深刻剖析了中国传统国民的劣根性:第一,虚荣。明恩溥首先谈到了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他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具有强烈演戏本能的种族”,脸面是最重要的事,可以为了它做很多没有必要的、与事实不符的事,甚至丢掉性命。要想知道中国人,“面子就是一把钥匙,用它能打开那只藏有中国人诸多最重要性格的密码箱”<sup>[13]</sup><sup>1</sup>。另外中国人的繁文缛节已经达到了让西方人头昏脑胀的程度,过度讲求形式,却不重实效。第二,散漫。缺乏时间概念,对于西方人而言“时间就是金钱”,而中国人却总是“显得非常悠闲自在”<sup>[13]</sup><sup>22</sup>。“晌午”、“午夜”之类的含糊的时间概念,即可以看出中国人时间观念淡薄又忽视精确,中国的思维模式难以理解西方人对任何事物都追求精确,这被认为是病态的癖好。第三,麻木、冷漠。中国人经历了比其他民族更多的苦难,面对这些事情,或许这在他们看来是命中注定的,所以都在默默地承受。“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作为整个民族似乎感觉迟钝、麻木不仁,如同冷血动物一般”<sup>[14]</sup>。冷漠体现在中国人缺少公共精神,“百姓们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只要自己的财产没有遭受损失,就都不会对公共财产表示出责任心”<sup>[13]</sup><sup>77</sup>。中国儒家思想的先哲孔子在《论语》中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明恩溥认为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导致了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冷漠,对与他们无关的事情不感兴趣”<sup>[13]</sup><sup>80</sup>。但“在二十世纪的争斗中,谁是最能生存的适者呢,是神经质的欧洲人,还是不知疲倦、无孔不入、迟钝冷漠的中国人?”<sup>[13]</sup><sup>68</sup>这是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第四,封闭。封闭导致中国人自以为是天朝上国的臣民,视其他民族为“蛮夷”之邦,蔑视外国人,盲目自大。M·G·马森批评说:“中国人把他们

的国家当作全世界的第一帝国,把他们的智者所传授的学说看成高于其他所有的哲学体系,所以长期以来,他们实行一种几乎完全闭关自守的政策,坚持认为外国的一切东西都是属于野蛮民族的,是不值得他们注意的。”<sup>[12]109</sup>正是这种态度导致由文明古国变为在各方面落后的国家。第五,保守。中国人厚古薄今的倾向让世界其他民族都望尘莫及。这种敬天、崇祖的思想和观念,造成了中国社会各方面裹足不前、落后保守的状态。而中国人的相互猜忌也是这种内在保守性强有力的佐证,它的力量如此强大,让中国成为一个谣言泛滥的国家,新的事物无法顺利进展。另外,知足常乐在明恩溥看来也是保守的一种具体表现。第六,缺少诚信。“中国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表现与真正的诚信如此背离”,这让西方人认为“虚情假意、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颜婢膝,正是这个民族非常突出的一些特征”<sup>[13]204</sup>。与西方人的开诚布公相比,中国人却拐弯抹角地表达了一些推诿与谎言。第七,迷信。祖先崇拜、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等等,各种迷信充斥着中国的各个阶层。“在现今所有的文明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迷信和轻信……富有的商人和博学的学者,都不羞于让别人看到自己每月花两天时间专门祭拜狐狸、黄鼠狼、刺猬、蛇和老鼠,还要在它们的牌位上写上‘大仙’二字,认为它们会对人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sup>[13]228</sup>。

明恩溥揭露的中国传统国民的劣根性基本概括了同时代西方传教士的言论,可以看做是西方人对中国传统国民性做出最系统论述的著作。他们以现代价值体系为标准,以西方民族性格为参照系,对中国传统国民性的评述有褒有贬,但总体评价基调不高,这与他们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和民族优越感是分不开的。

明恩溥的这些文章原是发表在上海的《字林西报》上,《字林西报》是著名的外资报纸,掀开了近代传媒产业的第一章,在当时报刊界颇具规模,影响巨大。这些文字一经发表,在国内外引起了相当的反响,作者应邀编辑成书。在中国经历千古未有之变局之后,在看到西方人士对中国传统国民性或赞扬或丑化的描述之后,中国启蒙思想家以此为—面历史的镜子,开始了艰难而又深沉的自我反思。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和《国闻汇编》,成为维新变法在华北的舆论阵地,希望通过报刊这一媒介,警醒世人。严复相继发表数篇文章,揭露传统国民性的弱点,分析传统国民性形成的原因,并建构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新民”形象。

#### 四、中西对比审视的视角转换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割地赔款,国家主权丧失,人民苦不堪言。对于中国的战败与落后,朝廷的高官大吏为一己之私利,闭目塞听,无视西方的先进,高唱驱夷之论。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纷纷进行民族的自我反思,严复以西方社会为参照,进行对比审视的视角转换,独到地分析了中西社会各方面的差异。

严复指出今日之西洋与中国以前所遇蛮夷之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无法之胜”体现在:“自其自由平等以观之,则其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有法之胜”体现在“自其官工兵商法制之明备而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皆有常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这是在制度方面的优势,另外“德慧术知又为吾民所远不及”<sup>[5]22</sup>,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历史观的不同。严复说道:“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治—乱、—盛—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中国人信奉治乱兴衰的历史循环论与好古忽今的复古论,而西方主张历史进化论,通过竞争以求胜图存。以此为历史观的中国圣人都以竞争为“人道之大患”,“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相安于无事<sup>[5]1</sup>。这种“平争泯乱之至术”,导致“民智因之以日羸,民力因之以日

衰”。而西方富强的真谛“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sup>[52]</sup>。

自由观的不同。“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而在西方“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sup>[53]</sup>，正是因为自由的不同，“于是群异丛然以生”，比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sup>[53]</sup>。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扼杀民众的自由，是导致中西社会差异的原因之一。

文化观的不同。“中土之学，必求古训”，特别是今日之八股取士，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实际是破坏人才的政策。而西方“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sup>[529]</sup>。西方重实践、重思考的学习方式，使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断发展，成为富强的基础。

严复通过比较中西社会的差异，对中国传统国民的劣根性有深深的忧虑，意识到改革社会以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国民性，塑造适应近代社会的新民。受严复言论的影响，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也分析了中西社会的不同，指出中国国民性的不足导致中国的衰弱。他说，中国“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一私人之事也”，而泰西“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以对于一团体之事也”<sup>[512]</sup>。中国人缺乏进取冒险之性质，这正是欧洲民族所以优强于中国者的原因之一。另外，中国人缺乏权利思想，而西方人则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我国民仰治于人”，无力自治，而西方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富于自治精神，“世界上最富于自治力之民族，未有盎格鲁撒克逊人若者也”；中国人力主复古，而西方人则推崇进步，“中国人动言郅治之世之在古昔，而近世则为浇末，为叔季，此其义与泰西哲学家进化之论最相反”等等<sup>[515]</sup>。

要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犹如晴天响雷，震动了中国社会各界人士，震碎了中国古老的民族自尊心。知识分子在体味痛苦的同时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反思过去，寻求未来救国救民的出路。北洋水师的失败不仅标示着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也标示着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方针的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作为执教北洋水师十余年的严复来说，心痛、无奈、悲愤，个中滋味难以言喻，他意识到紧裹皮毛的器物改革难以救中国于水火。

严复在留学英国期间，对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等各方面都有所了解，在回国总办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认识到其黑暗、腐败的本质后，潜心研究西学，翻译出版了数本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及法律方面的名著，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受近代西方人对中国传统国民性论述的启发，严复将国家贫弱的症结转移到了中国传统国民性上，在进行中西对比审视的视角转换后，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新民思想，希望通过国民素质的提高来达到国家的富强。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思想由此展开，开启了中国人的近代化进程。

#### 参考文献：

- [1]林则徐. 林则徐诗文选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243.
- [2]张应昌. 清诗铎[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676.
- [3]康有为. 康有为政论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37.
- [4]谭嗣同. 谭嗣同全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200.
- [5]严复. 严复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6]冯桂芬. 校邠庐抗议[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 [7]唐才常. 唐才常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32.

- [8]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55.
- [9]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M].何兆武,译.北京:中华书局,1998:8.
- [10]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53.
- [11]俞祖华,赵慧峰.旁观·比较·自省:近代中外人士三重视野下的中国国民性[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212-217.
- [12]M·G·马森.西方的中华帝国观[M].杨德山,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
- [13]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M].刘文飞,刘晓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 [14]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M].鞠方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204.
- [1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vestigation of Yan Fu's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Thought

Han Jianp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 Zhoukou, Henan 466001, China)

**Abstract:** Yan Fu's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thought influence is huge, and to analyze the reasons is benefit for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a. The national peril, in particular, the stimulation of the defeat of the 1894 Sino-Japanese war had a big impact on Yan Fu. The failure of social reform movements, especially the failure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Yan Fu realized that the material aspects of reform can not save China. So he thought that the reason of countries poor and weak is traditional national character, hope to achieve the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eople. The words inspired by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discourse in the West, have a reference about reflect on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The emergence of a new frame of reference, leading comparison of the qualit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nationals.

**Key words:** Yan Fu;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thought; national crisis;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western thought

(责任编辑 张春生)

---

(上接第 54 页)

## Between the Game and Conspiracy: the Evolution About the Meaning of Huanshu of Ancient China

Cao Li<sup>1</sup>, Jia Wenlong<sup>2</sup>

(1. Library of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100009, China; 2. Centre for Studies of Song History & College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Huanshu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Han-Jin Dynasty, as the popularity of Arts of alchemy and the inflow of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Huanxi, the meaning of Huanshu manifested with two aspects: alchemy Huanshu and acrobatics HuanShu, which were both confusing. Because the conflict of Hu-Han's folk culture, acrobatics Huanshu was once forbidden. But as the show skills, after integration into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acrobatics Huanshu contained confusing elements, which became an entertaining factors, therefore became an important alternative name of later traditional Xifa. At the mean time, the alchemy Huanshu's contained confusing more related to the folk strength. From the Song Dynasty, because the alchemy Huanshu had the colors of against the ruling order, so became important means to change reality and emotional sustenance of lower people in ancient China.

**Key words:** Huanshu; Alchemist; Huanxi; magic; folk

(责任编辑 张春生)